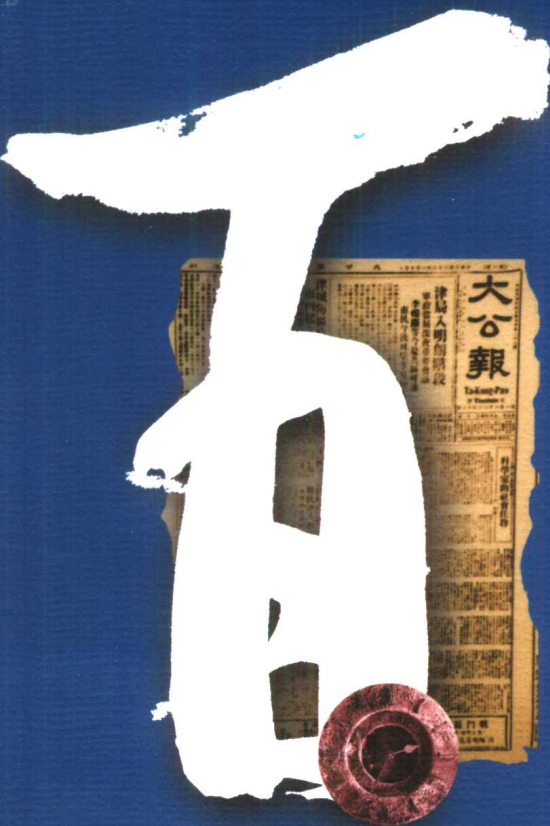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年沧桑

王芸生与大公报

◎王芝琛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学灯文丛
丁东 杨生主编

大公報

百年沧桑

王芸生与大公報

津局人明創設校

軍政當局深食不食行

李國慶等公杜其阻吁

市民方後因方受地大

◎王芝琛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印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沧桑:王芸生与《大公报》/王芝琛著. —北京:
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1. 9

(学灯文丛)

ISBN 7-5008-2549-8

I. 百... II. 王... III. ①报纸, 大公报—文化史
—中国②王芸生—生平事迹 IV. G21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4868 号

百 年 沧 桑

王芝琛 著

出版发行:中国工人出版社
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印 刷: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版 次: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230 千字

印 张:9.5

印 数:1~5064 册

ISBN 7-5008-2549-8/1·684

定价:18.00 元

出版人语

昔日大公报(今香港大公报除外)的确是一张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纸,但的确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。在两个中国的大决战中它鼓吹“自由主义”、“中间路线”、“第三条道路”;在抗战中明显拥蒋而贬共;在蒋对中共发难时,搞“小骂大帮忙”,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。作者认为大公报是民间报纸,“纯粹中立”。不偏不倚的完全中立事实上并不存在。我们对作者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,故在编发时做了若干删节。我党对大公报的批评,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也并非没有道理。

关于书名,作者原稿为《大公报往事旧闻》,现在的名字是责任编辑改的。

学灯文丛缘起

□ 丁东 王建勋

2000 年夏季，我们二人商议，组织一套学者思想随笔丛书，以“学灯”二字为题。

“学灯”，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。

你可以想象，一个学人，在灯前夜读，记录下思索的心得。

也可以想象，思想像一盏灯火，引导人们在学海里泛舟远航。

“学灯”并不是我们二人创造的名词。20 世纪上半叶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有过一个副刊，就叫“学灯”。它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 1918 年，几经沉浮中辍，最后结束于 1947 年，前后大约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。这个副刊谈教育、谈文化、谈艺术、谈政治、谈社会、谈历史、谈哲学。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沈雁冰、张闻天、叶圣陶、宗白华、郁达夫、田汉、俞平伯、冰心、许地山、王统照、徐志摩、傅雷、曹聚仁……本世纪许许多多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都曾在这里登台亮相，

发表文章。三十年间,这家报纸的副刊,前后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佳作,推出了多少学界新秀,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问题,引进了多少新鲜的思想,已经成为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,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。我们想说的只是,第一任编辑张东荪先生在《学灯宣言》中声明的宗旨“屏门户之见”,“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”,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

这套丛书与当年的“学灯”副刊没有渊源关系,今天我们也没有能力请来那么多鸿儒硕学汇聚一堂。但我们也想点起一盏“学灯”,屏门户之见,为当代学者开辟一块言说思想的园地。

人类已经步入了新的世纪、新的千年。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隐约感到,一个百家争鸣、万船竞发的思想文化格局,行将在中国出现。我们组织这套丛书,就是想为这个格局尽早形成,尽一份心意。

既然屏门户之见,这套丛书就不是一个学派、一路观点、一种思想主张,而是一个开放的园地,只要有思想有文采的文集,我们都予以欢迎。

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希望。

我们希望,这套丛书的文风应当是明白的、流畅的,而不是晦涩的、含混的;应当是朴实的、诚恳的,而不是虚伪的、造作的;应当是言之有物、论之有据的,而不是故弄玄虚、大而无当的;应当是关注现实、直面人生的,而不是回避现实、不着边际的;应当是平等待

人、以理服人的，而不是武断霸道、强词夺理的；应当是独立思考、自成一说的，而不是因循权威、代圣立言的。

今日之域中，人声喧嚣，世风浮躁。真正的思想者往往寂寞而孤独。愿我们这套丛书，能够把他们散落的思想火星集中起来，形成一盏灯火，化作我们民族的文明之光。

2001年5月

文人论政说是非(序)

□ 唐振常

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,论述国内报业兴起,往往夸古以饰今,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,事涉荒诞,人莫我信。且勿论“官门抄”、“邸报”之非中国报纸之祖先,即使晚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兴办了一些以“报”命名的印刷品,以及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,或称作“报”,或叫做其他名称,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(新闻纸),而更多类同于今天称作杂志的事物。中国之有报纸,远较西方历史为短。历史短,年轻势盛,生命力强,照说,报纸的寿命应该长了。事实相反,中国报纸多短命。试看,民国几十年间,开张大吉与关门落锁的报纸,真是此起彼落,不可胜数,看起来热闹非凡,却多没有是太太平平,寿终正寝的。其中因缘,诚然多端,寻其根蒂,则是百年历史变化急剧,社会动荡激烈,时代思潮起伏剧变,有以致之。于是,世纪两越,回眸历史,在这动荡的一百多年里,一张民间报纸,能够维持十几二十

年的生命,已属少见。求其能登百年,真是绝无仅有。有之,那就是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。今日大陆,北京大公报馆被消灭于“文革”大劫,然在香港特区尚有大公报在,统系相承,血缘与共,度此将临的百年之庆,非是冥诞,实有荣焉。

一百年的历史,一百年的报纸,值得大书特书,值得举杯为庆。大公报以一张民间报纸,开创草莱,1926年,吴鼎昌、胡政之、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收买股权,接办大公报,顺应潮流,锐意改革,几经风雨,立足不败,终于走进历史的辉煌。回溯以往,尽管因缘错综,百端多诸,然承传历史,办报宗旨明确,且愈磨而其末愈厉,实为纲领。

尝言: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,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,即:中国自晚清以来,创出了各种各样的报纸,非纯属商业性行为,有识的报业前驱,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,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。梁启超一生素志,是启迪民志,作育新民,以求得“具有共和国国民之资格”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“在报中为中人说法”,可见他着眼于广大的中等知识分子,“新民体”文章通俗易懂,用心良苦。梁启超办的报纸,从时务报到清议报到新民丛报,无一不是作为文人论政的工具,其为文业,笔锋常带感情,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的去取深具感情。宗旨明确,主张有定,文字精辟,论晚

清文人论政最具成绩的报刊,当首推梁启超所为。

和梁启超同时前后,革新分子参与报刊发为言论,也都出于文人论政。如章太炎前期参加时务报,后为苏报写文章,皆属文人论政;再后东渡日本,主持民报,民报虽是同盟会机关刊物,作者为文,于党见之外,亦有文人论政成分。文人论政最具典型,厥为苏报。章士钊主苏报笔政后,蔡元培、吴稚晖、章太炎等轮流为文,文人磨墨,倡言革命,终成1903年癸卯大狱。蔡元培之主俄事警闻(后改名警钟报),蔡元培、张元济之主外交报,陈独秀、章士钊之主国民日日报,皆不脱文人论政本色。民元以后,梁启超门下三少年黄远庸、张君勱、蓝公武崛起,所办少年中国周刊,以文人之笔,议论政事,风行一时。厥后张蓝改业从政,黄远庸以其锋芒毕见之笔,在南北各报指斥时政,捐党见而持公议,虽对孙中山、袁世凯,亦指其失,正是文人论政本色。陈寅恪先生诗云:“自由共道文人笔,最是文人不自由”,盖有感而发,与顾炎武“一自命为文人,便无足观”,是从两面立论。而当清末民初,书生报国,文人论政,倒是自由度较大。这段时期,以文人论政创立的报刊的作用,不可低估。

大公报之崛起,一本文人论政,承袭旧风,屡有发扬。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,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,曰不党,不为一党之见;曰不卖,不卖于私人或集团,不向外界取一分经济援助;曰不私,非一私之言

论,取国民之公意;曰不盲,一本既定立场,不盲从于众。此四者,实得文人论政宗旨之精要。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亦由此得保障。大公报本此初衷,几十年间坚执以赴,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,历经艰辛,终于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,成就其辉煌。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大公报孔昭恺说:“只有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。”(孔昭恺《旧大公报坐科记》)蒋介石每天必看大公报,而不满于国民党党报。国共两相对立,而其领袖同致好感于“不党”之大公报,颇堪寻味。反过来,两党也有对大公报口诛笔伐之时。好感也罢,笔伐也罢,这是正常现象。大公报历史之辉煌,表现于抗日战争的重庆时期。1941年,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破天荒地颁发荣誉奖章给中国的大公报,总编辑张季鸾立即出席庆典致辞,谓大公报成绩之取得,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本色。斯言也,可视为对大公报的论定。大公报最盛时期,同时有重庆、上海、天津、香港四馆(武汉只抗战初期以为入川之过渡,桂林馆于湘桂撤退时停止),以一财不大气不粗的民间报,而能成此规模,亦中国报业史上所仅见。今之青年,多不了解昔日大公报为何物,有两本书,周雨的《大公报史》和吴廷俊的《新记大公报史稿》可作参证。

如果用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,文人论政不是标语口号,是本人民的立场,是其所是,非其所非。是非之

间,容有偏差或欠准确,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。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,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,有其公是公非,一切惟人民利益是从。时代的进化,历史的进步,大公报之可贵者,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。既符合时代潮流,又保持其独立精神。诗云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”大公报以一个老字号,而膺维新之命,无论从言论的开辟,版面的改革,以至文字的革新,学术的探讨,都日新又新,良有以也。

公元1949年,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,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。文人论政亦随旧时代而消逝,大公报不再有昔日的辉煌。此是自然之理,事物变化之迹,不可得而言焉,亦不宜得而言焉。天津大公报易名为进步日报出版,重庆大公报变而为重庆日报,上海大公报虽仍旧观,实无以膺新命,1953年初北迁天津,与进步日报合并成天津大公报,以后再迁北京,至“文革”之难而寿终非正寝,仅剩下一个香港大公报延其命脉。历年以来,大公报人亦用自己的手去推倒大公报赖以立策的文人论政之基。此亦自然之理,事物变化之迹,不可得而言焉,亦不宜得而言焉。

照说,昔日大公报已成历史(香港大公报除外),对于文人论政的最后一家报纸——大公报之是是非非,应该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评论,而勿须立足现实加以评说。事实不然,多年以来,评点大公报之文屡见,且各执其说,互不相下。其中,争论最多的,是“小

骂大帮忙”说与“非小骂而是大骂”说。小骂大帮忙者指大公报对国民党政权只不过是骂，不伤筋骨，而在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，则是大帮忙。持此说者，可以举出例证，以张其词。反对的论者，同样也是举出例证，证明大公报对国民党政权屡有大骂，并遭国民党政府多次惩处。这样的争论，事实上都能成立，两造便成相持不下。其实，大公报既倡文人论政，以其所见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必与小骂大帮忙或非小骂而是大骂均无关涉，须得就事论事，而不管所骂所批评的对象是谁。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并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原则，文人论政办报，亦求秉此原则。议论大公报，是议论历史上的大公报，是研究历史。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，是要纳入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去考虑去论断，脱离了历史的背景，甚而以今天的政策或所要求于今日报纸者，去作论断，去要求一个历史上的报纸，不是唯物史观，是反科学的。这样，也就不能从历史中求史识。几年来，关于大公报是非的讨论，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从反面提醒和要求我们如何去对待历史，研究历史，通过历史的研究，也许会头脑清醒一些。

历年有关大公报的讨论中，王芝琛写文章最多，今选出40篇，成为一集，即将梓行。芝琛是王芸生先生哲嗣，所学事业，既非新闻，亦非历史，更从来没有在大公报工作过，只因庭训所得，得闻大公报经纬，亦

因家庭关系,与大公报人多所接触,对昔日大公报有所了解,耳濡目染,渐成癖好。几年来,芝琛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,悉心研究,并采访大公报故旧,广搜博采,于大公报研究,卓然成家。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,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,朋辈中无人能及。在全国报刊中,芝琛所写大公报文字,广为发表,深得好评。其中大多数文章,发表时或发表前,我曾看过。文章最大特色,是信而有徵,以事实为据,不空谈,不虚夸。其次,不作危言高论,但直道其事,直述其经过,读后自然形成结论。集中文章,或为有关大公报争论的重大事件,如“小骂大帮忙”,如《起义云乎哉》及其续篇,如因“修明政治”案而引起的大公报社评事件,……文章均以事实为依据,还其历史真相。比如,香港大公报“起义”之说,始作俑者为出身大公报的萧乾,当时包括我在内,谁都不以萧乾之说为然,但我始终不明白,萧乾此说因缘如何,目的何在。集中《“起义”云乎哉续篇》对此有详尽叙述,乃是如实记载。集中亦多大公报轶闻旧事,娓娓道来,如话家常。此类文字,不会见之于《大公报史》或《新记大公报史稿》,读之可以补二史之所未载。集中更有人物记载多篇,作者于其尊人王芸老,写来自是真切,张季鸾、胡政之、曹谷冰诸前辈先生,芝琛幼亲馨咳,闲闻写来,亦具精神。难得的是《座中多是豪英》一篇专文,所写人物众多,但凭文字资料,能写成如此翔实生动之作,诚

不易矣。

乐见此集之成，乐为之序如上。

2000年7月22日盛暑中



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(1867-1926)



英敛之手迹



宣統庚戌四月照於津門

英斂之偕夫人及兒子英千里